

794 1-2 (卷 1-2)

文史通讯

- 周恩来同志的一次讲话 (摘录) (1)
胡耀邦同志谈老同志写回忆录 (1)
王首道主任在业务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
关于向老科学家作调查的几点设想 裴丽生 (3)
响应号召, 写好革命回忆录 李逸民 (5)

信箱

- 老干部刘贯一同志的来信 (7)
存真小议——陈允豪同志来信 (9)
一封审稿人的信 (10)

资料摘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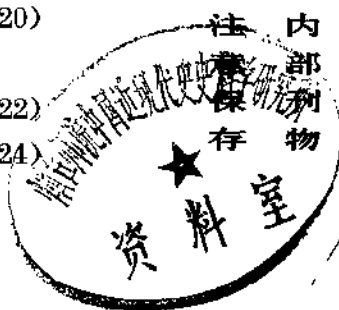
- 关于《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的一些意见 (11)
项英同志是怎样牺牲的 武大党史教研室 (15)
忆上海工人领袖刘华同志牺牲经过 张维祯 (8)

经验交流

- 怀着高涨的热情, 作好文史资料工作
——政治组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今后计划 (16)
充分发挥业务组的作用, 军事组积极进行组稿
审稿工作 (19)
为广泛开辟稿源, 文化组召开工作会议 (20)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 (22)
内蒙文史资料工作情况 (24)

简 讯

-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召开业务组工作会议 (25)
一批革命老同志开始撰写革命回忆录 (26)
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恢复工作 (26)
征集体育史料座谈会简况 (4)



2

1979.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71-6

周恩来同志《对在京的话剧、歌剧、 儿童剧作家的讲话》(摘录)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七日)

戊戌政变时期的老人，辛亥革命时期的老人，文史馆的老人，有很好的掌故，但也会有他们自己片面的看法。党成立以后的一段历史，要找党内的同志谈谈。但就是这些革命老人，也不是任何人的看法都一致的，也可能有片面性。第一，他们可能只知道这一点，不知道那一点；第二，他们知道的这一点，看法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所以访问者自己也要有水平。作家要有自己的水平，要能把时代的特点抓到，把历史的真实抓到，把艺术的真实抓到。

胡耀邦同志谈老同志写回忆录

我们有许多工作要作，我放了好几次空气了，主张许多老同志不兼实职的工作，拿出不多的年头来写革命回忆录，我看这是很好的事情。写革命回忆录，可以从大革命写起。写完了怎么办？也可以写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嘛！因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我的意见，有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或者自己动不了手的，可以给他配上秘书，或者配材料员，或老由出版等有关部门派人帮助工作。老同志做这些事，是很有意义的，作出的成果是教育后代的无价之宝。我觉得，在岗位上工作的同志可以为党多做贡献，不任职的同志也可以为党多做贡献。

——摘自胡耀邦同志《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召开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王首道主任在业务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记录稿)

今天这个会，两个组汇报了工作，几位同志提了些意见。

政治组的工作抓得好，工作精神很好。文史工作还是事在人为。组织工作要细心，要热情。做文史工作，就是做统战工作，就是做革命工作。我们各个组都这样做，就会做出成绩来。

物质生产要原材料，写史也要原材料。我们就是尽量搜集材料，为写好现代史、革命史服务。一方面搜集史料，一方面还要充分发挥史料的作用，尽量避免把史料藏起来，烂掉。要同有关部门合作，编出目录来供写史部门利用。我们不写史，是做写史的基础工作，我们是个“材料工厂”。

周总理五九年提出的征集史料的范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现在晚清时期、北洋时期的人很少了。从“五四”到建国三十年，从革命胜利到现在又三十年，征集史料的范围可以扩大一些。

革命史料，政协该不该搞，温济泽同志谈到非搞不可。我们政协有政协的条件，现在全国各省、市以至有的县都恢复了政协，有这个机构，就可以提供一些物质条件，就有人去搞。政协委员中有许多革命老同志，有的同志日常工作不那么忙，也有时间去搞。我们就现有的条件，要重视征集革命史资料的工作，这是革命的责任。

写革命历史不能孤立地写一面。当时革命的同盟军、革命的朋友、统一战线、民主党派，都要包括进去。孤立写一方面是不全面的。

我们政协这个范围里有哪些同志和他们的朋友可以写革命史料，要列出个名单来，先发个信，请人家作个准备，自己能写的自己写，自己不能写的请人代笔也行。

史料要高质量。要从大量的材料中提取有价值的史料，为写史提供有价值的史料。有些史料里有沙子，有渣子，甚至还有假的，要做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工作。比如苏州监狱座谈会的方式就很好，把座谈的材料集中起来，还可以到苏州地方去找资料核对，这样就更好了。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

关于向老科学家作调查的几点设想

(裴丽生同志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科技组讲话要点)

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正在全国各地积极稳步地发展，而科学研究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处于先行地位。为了今后顺利开展我国的科学事业，还必须弄明我国近、现代的科学史，用以教育青年科学家、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广大工农兵循着老一代科学家开创的道路前进。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十分有价值的工作。对前人的努力，要重视。这里有个向老科学家作调查，“抢救”科学历史史料，“抢救”科学遗产的问题。

我们已向考古学家裴文中同志搜集他发掘“北京人”头盖骨全部过程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向地理学家李明岗同志采访他在甘肃民勤县坚持治沙二、三十年的艰苦经历；向美术家常书鸿同志探询他孤身去敦煌石窟工作几十年的详细情况；调查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创建经过等等。总之，这方面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调查对象可以先从年纪最老的或有病魔缠身的老科学家们着手。因为他们年岁太大，若不抢先采访他们的科学事迹，我国近代、现代的若干科学发展史实就要失传了，例如，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同志前不久逝世了（他惋惜地说）。也可以向已故的科学家的家属、同代人、弟子、知情人作调查。还可以作些文献研究。这点，可以先由全国科协根据所属学会的档案以及科学院所属各学部的档案提出一百位七十岁或七十五岁以上的老科学家名单作为初步调查对象。

调查访问工作大致可分以下三类：

一、记录整理者科学家的履历、治学史、科学攻关史、创业斗争史、有意义的或有趣的生活片断，等等。

整理后，交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科技组、全国科协、本人或家属各一份。

二、建立老科学家个人的档案，积累有关文献资料，进行科学人物和近、现代科学历史的研究。

在刊物上开辟专栏，介绍科学家，介绍我国自然科学的小史、简史、编年史、发展史等，甚至编辑成书。

三、登记已故科学家的遗著、科学遗物（如仪器等）、科学实验照片、信函、肖像，等等，先由家属妥加保管。有价值的遗著，可以陆续编辑出版，并给予报酬。

为了便于进行上述调查访问工作和登记已故科学家的遗著和遗物，必要时可

以召开座谈会座谈老科学家的事迹，或成立专门委员会来研究如何开展调查访问工作。还可以请各学会草拟文件，号召已故老科学家的弟子、朋友撰文介绍他们的老师或学友的经历、生平，并协助搜集已故师友的遗著或遗物（如我国最早自制或引进的某些科学仪器）。

条件成熟时，除《科技馆》（以物为主）外，还将兴建《科学家馆》（以人为主），以便用来对广大科学爱好者进行科技史教育。

先通过拜访家属、记录等，整理后请老科学家过目，复核有无不妥之处，并求得他们的指导和修正。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四日）

征集体育史料座谈会简况

本刊讯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于九月三十日在政协礼堂联合召开征集体育史料座谈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科教组董纯才同志在会上发言，参加会的有在京老体育工作者三十二人。

董纯才同志说，体育方面的史料，过去征集、发表的数量极少，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钟师统回顾了“四人帮”对体育史料的征集和编辑工作的破坏，号召大家抓紧时间“抢救”体育史料。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指出：经过“四人帮”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大浩劫，我们自己手中的资料丧失殆尽，不少人年高多病，因此“抢救”史料的工作必须十分抓紧，而且必须把大家都发动起来，集思广益，才可能征集到比较完整、准确的史料。

一些同志还在会上表示要解放思想，积极撰写体育史料，如刘长春同志说他已经写了两万多字的《参加一九三一年奥运会始末》的史料，还准备写些别的。林朝权同志是台湾省第一代体育总干事，他表示要为台湾回归祖国多做些工作，并准备着手撰写台湾体育史料。有的同志建议发动港澳体育界人士撰写港澳史料。

响应号召，写好革命回忆录

李逸民

最近，看到胡耀邦同志的一个讲话，号召老干部写回忆录，指出这是“教育后代的无价之宝”，而且是留下来一份“精神财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感到写好回忆录是我当前必须要做的事。

虽然我是个顾问，由于自己没有努力去争取工作做，采取等的态度，加上同志们的照顾，我实际上很少顾，也很少问，所以是比较清闲的。在向四化进军中，大家都在出汗出力，争取多作贡献，我能贡献些什么呢？我想大贡献办不到，写点回忆录还是可以的，所以我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之后，已经写出初具轮廓的回忆录。

当然，象我这样的干部，写点回忆录不一定能教育后代，也不会是“无价之宝”，至于“藏著名山，传之后世”就更谈不上了，可是留下一点一生的痕迹还是可以的吧！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一辈子总是战斗过来的，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写一份回忆录让后代看看他们的爸爸爷爷活着的时候做了些什么，有些什么好的经验，有些什么教训，这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替旧人”，我们的后代一定比我们这一代聪明，他们会走自己的光明大道。至于我们，拿我个人来说，回顾这一辈子的历程，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可也做了不少蠢事。我希望我们的后代能从我们这一辈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多做好事，少做蠢事，因为做了蠢事，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也就不能算一个好的人民勤务员。

我觉得写回忆录，不管是写经验还是写教训，都是我们实践过来的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地把它写出来，一是一，二是二，正如胡耀邦同志说的那样，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夜郎自大。那怕自己是一粒沙子，这粒沙子毕竟是存在过了的，把它作为将来革命历史的一点真实材料，我想是有好处的。

我们这一代，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经过了艰难困苦，万水千山，我们做错了的事，写出来留给后代，希望他们不要再做，我们做对了的，希望他们继续做下去，现在大家都说发扬光荣传统，我想，光荣传统还是毛主席说过的两句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我们这一辈子经过实践体会了的道理，也是我们青年所应该明白的道理。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有两种回答，一种是为了自己个人

的所谓幸福而奋斗，另一种是为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我们相信后一种回答，现在大家不都在谈提高生活水平吗？可是，在一个共产党员看来，在广大人民生活没有提高以前，不应去谈什么个人享受，如果要进天党，应该是天堂大门打开的时候，让人民大众先进去，而共产党人应留在最后。现在我们在建设地上的“天国”，但还只刚刚开始有了一点基础，我们老一辈有责任带领青年继续吃苦，和人民大众一起把地上“天国”建立起来。

我的回忆录，一定要想法写好，既要写好的一面，也要写错误缺点的一面，我觉得千万不能装腔作势，鼻子插葱，以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拿我个人来说，缺点错误很多，如果将来见到马克思，还要作一次彻底的检查，不说别的，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做错了事，搞错了人，现在回头一想很不少，如果这方面能实事求是地写出来，对后代真有点教育意义，我们走错了路，唱错了歌，叫后代不要再走，也不要再唱，如果说写回忆录有什么必要，还有什么意义，我想问题就在这里。

另外，我又想起当年和自己一起参加革命的好同学、好朋友、好同志，差不多都牺牲了，现在留下来寥寥无几，屈指可数，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他们没有什么回忆录留下来，我们应该为这些同志留下一点纪念文字，作为我们后代学习的模范，真正值得学习的是他们，这也可以说是促使我写回忆录的动力吧！

所以我完全拥护胡耀邦同志关于老干部写回忆录的号召，感到这是我们这一辈人应尽的职责，由于本人水平所限，写出来的东西，人们不一定能看得下去，可是这件工作既然动了手，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它。我也希望老同志们大家都动手来做这件事，把我们亲身参加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从各方面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也算为四化作点贡献吧！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按：李逸民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参政治部顾问。

老干部刘贯一同志的来信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同志们：

读了《文史通讯》第一期，深感兴奋和欣慰！这里我想对文史资料工作谈些感想和建议。

我认为，善谋国者，必须善于研究当代和历代的历史，并从中吸收有益的经验 and 重大的教训，作为借鉴，以决定治国的方针政策。因此，搞好历史资料的搜集并发挥其作用，它的意义是重大的。文化革命前，您会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无疑地在全国起着重大的作用，对我个人的学习和了解有关历史事件收益甚大。我曾完整地保存了一套，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散失，至今犹深为痛惜！

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但要善于分析形势，而且还要深入研究这种形势发展的过去和未来，要研究在历史发展中各阶级的作用和动向，以确定新的战略和策略。目前，我国的阶级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剥削阶级消灭了，敌、我、友三方也改变了。然而这种变化是经过了长期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历史发展的必然，经历这个发展过程的人，就是历史的见证人。文史资料工作的任务，也就在于把这些人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作为第一手资料，提供研究者参考，使其为实现“四化”的战略目标服务。认识到这一点，也就看到文史工作的重要性所在了。因此，我希望全国政协系统及所有党内外的老同志，一齐关心和努力来搞好文史资料工作。

要解放思想，把自己所亲身经历过或看到的历史事实写出来，不要怕人说“沽名钓誉，宣扬自己”的闲话，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写作。组织上也应给以帮助和支持，应给说闲话的人做工作，做文史工作的促进派。而撰写者更应消除顾虑去掉余悸，避嫌的态度是无益于这一工作的。进一步说，也是无利于国家和人民的。

写史料要着重于翔实材料，对于文采则不必苛求，因为许多人，特别有些革命老干部，在旧社会根本无机会上学，参加革命后虽学些文化，但工作很忙，也不可能学得很深，如果要求他们写成象文学作品那样是不应该的，更无助于史料的征集。沙里淘金，万担沙土，一旦淘出一两黄金，也是光彩夺目绚丽非凡的。我想搞好文史资料无非也是这个道理。

抓紧对间进行“抢救”，采取广泛联系接触是文史工作的迫切任务，有的还要具体给以帮助。如给不能写的同志配备写手，派人录音整理等。同时，我认为除适当付给以稿酬外，主要应注重精神方面的鼓励，如给予一定的荣职，或请他

们参加一些会议或活动等等。自然，各级领导如能给予适当的慰问和照顾，自是作用更大了。

我这封简短的信，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您们能把文史资料工作搞得更好，这是一切关心文史资料的同志切盼的。刍荛之言，仅供参考！

此 致

敬礼！

刘贯一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忆上海工人领袖刘华同志英勇牺牲经过

张维祯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封建军阀将上海工人领袖、上海总工会常务委员刘华同志逮捕，十二月十七日，军阀孙传芳下令将刘华同志秘密杀害，并丧尽天良，灭尸不宣。

刘华同志的牺牲，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据我所知，也是和张国焘直接相关的：

刘华同志被捕后，敌人特务掌握的刘华同志相片是个瘦子，而这时的刘华同志因住了几个月宝隆医院，人比较胖，又改了姓名，敌人一直没有认出来。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间，上海总工会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当时不叫代表大会），选举领导机关，张国焘出席了这次会议。张国焘胡说什么外国的敌治犯只要一选上议员，政府就得释放。他提出选举刘华同志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公开宣传，并要各厂派代表到敌司令部要求释放我们的副委员长刘华。当时大家都没经验，听信了他的话，选举了刘华同志为副委员长，各厂工会遵照张国焘的指示，派了许多代表去淞沪戒严司令部，强烈要求释放刘华同志，致使刘华同志身份暴露，英勇牺牲了。

后来，在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我们从孙传芳司令部的档案中，发现外国领事给孙传芳一百万元钱，让他秘密杀害刘华的文件。

刘华同志的英名将永世长存。

注：此文摘自张维祯同志稿（石肖岩整理）：《一九二八年以前上海职工运动的基本情况》，全文将在《文史资料选辑》发表。

存 真 小 议

编辑同志：

您好！最近有几个关心文史的同志在一起谈起关于文史存真问题，都觉得“说时容易做时难”。比如，有位老同志写了一篇回忆录，回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打入敌伪军内部做秘密工作的事情。稿子寄给一个刊物，编辑部看了以后，请他修改。提出修改的主要意见是：“有关个人的事是否可以少写一些。”意见提得很委婉，但弦外之音是很清楚的。后来，作者就把原稿中涉及自己的部分大删大改了一委，修改以后，“利用写回忆录吹捧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在十年浩劫中许多写过回忆录的人都被扣过这样的帽子）的嫌疑可以解脱了，但文章的活泼生动大为逊色，更谈不上亲切感了。从文史存真来说，也打了很大的折扣。

至于写回忆录的大小忌讳，真是门目繁多，言之不尽。说是“史无禁区”，其实“禁区”林立，有些“禁区”也没有什么明文规定，而是多少年因循下来的“老习惯”。有些事情，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一到下笔，却又“讳”了起来。比如，两年前听有位老同志谈到曾与某高级领导人一起在白区某城市工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开始前，这位高级领导人准备撤离该城，回解放区去。临行前，这位领导人自己掏腰包约请了文化界的几位知名人士一起到该城一家绍兴酒店吃了一顿阳澄湖大闸蟹，以表临行惜别。这位领导人还在小宴中示意不远的将来就能回来，再来此店喝酒吃蟹。这种事本来是很有意义的，写进回忆录里是没有问题的，但考虑到这是否会损伤领导人艰苦朴素的形象，因此，有关回忆录中至今还未见写及此事。

还有一些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人写完人”，“金写足赤”，反之也如此。比如，在某年某月行文写及某人时，某人正属于被否定人物，那就一二三，七八九，条条都是坏的（“四人帮”横行时，对革命干部就是这么干的，这种流毒至今还不能说已经肃清。）但也有另一种情况，比如，某年某月再评某人时，是属于肯定人物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应该的），因此一点缺点也不能写了，一二三，七八九，都是完整无缺了。这就往往落入另一个片面性，有点失真了。比如这个人物是一位百战将军的话，本来不可能仗仗都打胜，打仗本来是有胜也有败，写胜利的经验，也写失败的教训，这才更符合史实，更能教育人。可是动起笔来往往不能这样写了，编书的人也往往不能这样编了。

还有一种奇怪的情况，比如写某个反面人物的罪恶史时，涉及了另外一些人之事，这些事实，既不属于这些人的错误，亦无批评之意，更谈不上属什么方面

的问题，可是也往往会引起轩然之波。这就难免有点过份了。史实存真，实不易也。

写历史，应该是实事求是，忠实于历史的真面目。既不造神，也不造鬼。写英雄人物，也是写有血有肉入情入理的人，才能使读者觉得可亲、可敬、可学。而决不是把英雄人物写成不食人间烟火食的神。反面人物也是生旦净丑各有特色，一个脸谱，一个腔调，恐怕也未必合乎存真的要求。

以上所谈，都是文史存真问题的小而言之的几件琐事，但类似之事是经常会遇到的。怎样解决才算合适，还要靠作者和编者的共同实践，共同努力。文史要存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两条是必不可少的，但动起笔来却很不容易真正做到。作此小议，以供《文史资料选辑》编辑同志的参考，也算作为一个热心的读者，对文史工作的一点希望。不当之处，还请指正。

敬祝

编安！

陈允豪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封审稿人的信

亚哲同志：

昨天突然收到你写的《护送共产党人从新疆回延安》（见《文史资料选集》第六十九辑）的回忆录，写得太晚了，要是文化革命前写就好了！我因为新疆监狱的问题，被关了五年牢房。但真理终究是真理，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绝不会变成叛徒的。一九七五年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新疆“叛徒案”平反了，我也恢复了工作。你的回忆录中的基本情况，我仍记忆犹新，因为我当时也是负责人之一。我觉得写得最好的是洛川和边界交接两段，西安那段也写得很好！但你接受任务时的心情和在兰州飞机场停留两天时的心情写得简单了些，再写详细些就好了。

我希望你这篇回忆录能登《文史资料选辑》，它是一篇历史的见证！

顺 祝

家 安！

谢 良

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于北京

关于《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 的一些意见

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受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编委会的委托，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邀请了部分革命老同志对《长编》一书进行了座谈，会议由沈经农同志主持。

陈维稷同志首先发了言，对《长编》提了一些意见。

吴亮平同志就苏区的经济工作情况作了介绍，并就一些问题作了详细的解答。

他首先说，《长编》这本书，我只翻了一下，看得不多，无准备。我完全同意陈维稷同志的意见，这本书是花了力气的，很有价值，他们搜集和保存了很多原始资料，走访了许多老同志，在很短的时间里编出了这么厚一套书，下了很大功夫，不简单，值得称赞。

接着他说，我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到中夫苏区瑞金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离开瑞金长征，在瑞金整整两年。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主要也是这两年。当然，“一苏大”后经济工作就开始进行了，但比较多的抓经济工作，还是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长征以后，苏区成了游击区，就没有什么经济工作可作了。

先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开展经济工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时间短，只有两年多，区域小，中心区域只有十九个县。人口号称三百万，实际没有那么多。经济很落后，远离大城市，没有近代工业，是一个农村经济区域，有点手工业，有点商业。在这样一个地方，要维持八至十万红军，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也有万把人，要供给上十万人的吃穿用，很不容易呀！当时是一切为了前线，同对又要改善人民生活，在“二苏大”的报告中，毛主席专门讲了这个问题，而且人民生活也确实有所改善。这就是因为我们开展了经济工作。毛主席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经济工作的任务是两个：第一、支持革命战争；第二，改善人民生活。当时，我们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包括毛主席也和大家一样，当对干部艰苦的生活和作风，很值得写一写，用以教育下一代。毛主席和我们一起，经常帮助农民打扫茅坑、扫院子、种地。每人每餐都是一包饭，数量都是一样，饭量小的分给饭量大的同志吃，大家都互相关心。菜是什么呢？就是吃些芋头杆子（喂猪的饲料），苏区老百姓是不吃的，可是我们拿来当菜吃。当时，由于敌人经济封锁，没有盐吃，我们就熬硝盐，味好苦呀！后来，钱之先同志通过外贸，搞了点盐进来。那时没有零用钱，每人每天一毛至一毛五分钱的伙食费，还得节省一

点伙食尾子，每人每天二分钱，吸烟的同志可用这点伙食尾子买点旱烟抽。中央各部还自己养猪，我们国民经济部也养了猪，有一次我们部杀了一头猪，给毛主席送了一点去。毛主席说：你们以后不要给我送了，不能吃同志们的猪肉，留着同志们吃吧！毛主席喜欢吃辣椒，经常搞点吃，他说：有点辣椒吃就行了。当时，我们每年发一套厚棉衣，这些布也是钱之光同志通过外贸搞进来的，不然，衣服也穿不上。这么个环境，干部非常艰苦，应在《长编》里面把这个情况好好写一写。

在这样的地区，有什么经济工作可做呢？毛主席给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了支持革命战争，就必须做经济工作。经济工作是伟大的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很重要，政权要维持下去，要把人民团结起来，非搞经济建设不可。生活越困难，斗争越艰苦，就越要搞好经济工作，越要关心人民生活。抓经济工作的思想，是毛主席开始提出来的。经济工作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陈云同志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他也是抓经济工作的。“四人帮”把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反对搞经济建设，他们根本上就是反革命。我们总结那时经济建设的经验，对批判“四人帮”是很有力的。总之，一定要讲清楚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关系到人民的问题，关系到战争的问题，关系到党和群众的联系问题，关系到根据地和部队能不能存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怎样做经济工作？

毛主席亲自做调查，实事求是地抓经济工作。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经济工作搞什么？毛主席说：一是了解情况，二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搞了耕田互助，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和粮食调剂局，还组织了运输、木工、泥瓦工和造纸合作社等，组织群众发展了合作社。当时，苏区没有什么机器工业，我们有用机器的小型军械修理厂、印刷厂，电机也是从上海运来的，主要的是手工业。最大的手工业是造纸，那里竹子很多，生产毛边纸，还生产一些宣纸，福建生产的连丝纸最好，苏区最大的钨矿，也完全是手工业生产。当时苏区合作社发展很普遍，解决了很大问题，那个地方虽然很穷，但建立了合作社，把群众组织起来了，生产有了发展。所以，怎样做经济工作？就是调查研究，组织群众。这样，市场活跃了，当时，银行发了很多钞票，因为市场活跃了，市场有东西买了，钞票也好用了。那时，银行行长是毛泽民同志，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很能干。

第三个问题，如何同敌人的经济封锁作斗争。

敌人对我们的政策，一是军事“围剿”，二是经济封锁，即一是打死你，二是困死你。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开始，我们的困难很大，尤其是缺盐。谁运盐进苏区，就要杀头。人不吃盐就没有力气，红军就不能打仗，一天不吃盐还可以，长期不吃盐是要死人的，再好的菜没有盐也不好吃。怎样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呢？

我们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任何事物总是有矛盾的，你们找矛盾嘛！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因此，我们发现广东军阀陈济棠和蒋介石有矛盾，他要钨砂出口，我们就组织了钨矿公司，这是我们在苏区搞的第一个工业公司。我们给广东军阀陈济棠钨砂，他们给我们盐、布、西药等。为了保证我们最必要的轻工业品，钱之光同志做了很多工作。红军所需要的武器弹药，我们主要是靠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给我们运来，我们的兵工厂主要还是一些小型修械所。为了解决没有盐吃的困难，我们还组织了群众开展熬硝盐运动，千方百计地保证部队的供给，我们还组织了粮食合作社，调济粮食市场。

再就是发展苏区内部的农业生产。我们之所以能够支持到长征，经济战线上的组织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的经济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我们这套干部都是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大家想办法，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的经济工作做得好，就是依靠了群众，把苏区经济组织起来了，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中央已决定要走（即长征），临走之前，毛主席把各部的人找去，在一个山里开了一个会，叫做“深山会议”，各部的部长都去了，毛主席要我们把群众安排好，他时刻不忘群众，就在这将要离开瑞金开始长征之前，他还要我们把本地干部群众安排好。

总之，这段工作是好的，工作方法、干部作风是好的，经济工作的路线也是正确的。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的“左”倾，主要是前期的。这一段主要是执行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另一个统一战线问题，即对待十九路军采取了错误政策。毛主席是主张支持十九路军的。

经济工作的思想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经济工作一开始就是毛主席领导的。张闻天也管了一段，张闻天和博古不同，他虽有错误，在经济工作上他还是听毛主席话的，真正领导经济工作的是毛主席。当时，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是找毛主席，毛主席也常和我们商量，在经济工作上，王明路线不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一是毛主席亲自抓经济工作，二是博古他们不懂经济工作。当时抓经济工作的，除了毛主席，还有陈云同志。张闻天和博古他们不同，他虽然也是二十八个半里面的，但对二十八个半也要具体分析，张闻天和王稼祥是好的，在遵义会议上，他们投了毛主席的票，起了重大作用。

亮平同志还回答了同志们提出来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查田运动和富农问题

在我印象中，两个文件《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是好的，是毛主席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写的。当时，毛主席一是抓经济工作，二是搞调查，三是找干部个别谈话。毛主席那时和瞿秋白有很多诗词往来，我还看到过几首，可惜，这些诗词没有保存下来。

对富农的政策，是削弱而不是消灭，对地主是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王明的“左”倾错误是消灭地主个人和消灭富农阶级。毛主席的主张是削弱富农经济，消灭地主阶级。

至于李立三的土地路线，在我的印象中也是消灭富农，我缺乏材料，不了解情况，不能信口开河。

为什么要查田呢？一是战争需要，要巩固后方。二是在过去的分田中，有些地方搞得不够好，要补课，把那里的分田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查田是为着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为革命战争的需要。一九三三年开展的查田运动是毛主席领导的，还在瑞金搞了试点。他派王观澜同志去叶坪蹲点。王观澜当时是土地部的秘书，部长是胡海。查田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错误，比如把中农搞成富农，把富农搞成地主，把富农集中到“劳改队”里去，把地主扫地出门等。

二、关于A B团问题

关于A B团，一是有，二是有扩大化。尤其是李韶九，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他请人去吃饭，在吃饭中间把人家拉出去杀了。在其他苏区也存在肃反扩大化的问题。鄂豫皖最严重，抓着戴眼镜的就杀，湘鄂西也比较严重。当时，在苏区把肃反搞得扩大化了，主要是不重视调查研究的结果，靠逼供信。这是根据地中的一个严重教训。我们要引以为戒。关于A B团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不了解，没有发言权。

三、关于“二苏大”的报告

“二苏大”的报告，是毛主席亲自写的。这个报告稿子我看过。当然，毛主席这个报告，也是要送请临时中央批准的。至于在这个报告中，有些观点看来有些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该了解毛主席在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他在中央没有发言权。毛主席当时在中央苏区的处境，就象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一样，忍辱负重！当时，上面还有个临时中央，是被推行王明路线的博古他们控制着的，毛主席的报告还是要送请他们批准的，个人服从组织嘛！所以，在报告中有些地方还不能不反映他们一些观点，不能不在某些地方有所妥协，在当时也只能如此。要正确理解当时这个情况，毛主席那时是受排斥的。我记得，有一次开会，我也在场，亲眼看到了，博古念了一个电文，要调毛主席去苏联学习，事实上就是要赶毛主席走。毛主席当时表示身体不好，拒绝了。如果那次真把毛主席调走，长征的前途不堪设想。要充分理解毛主席的处境，他在“二苏大”的报告，总的说是好的，当然，也有些缺点。要从总的方面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要全面地看，不要钻牛角尖，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了不起的。至于其他方面有些什么问题，那总是容易解决的。

座谈会后，王学文同志还送来书面意见。

项英同志是怎样牺牲的

武汉大学党史教研室

《文史资料选辑》五十七辑刊登了一篇文章，说项英同志是“皖南事变”突围时被国民党打死的，这回忆是不正确，为了恢复历史真实，必须加以纠正。

今年五、六、七月，我们“项英研究组”跑了安徽、江西、江苏、河南、上海等省市，向项英当时的部下、同事，如新四军侦察科长谢忠良同志，项英警卫员郑德胜、李德和同志以及当年新四军的部长、处长、科长等三十多人，作了详细调查，他们一致要求将项英如何牺牲的情况写出来给以更正。

项英是“皖南事变”两个月后，即一九四一年三月清明节那天，在赤坑山蜜蜂洞被项英的副官管理员叛徒刘厚总打死的。

事件的经过如下：

“皖南事变”后，项英、周子昆等同志没有灰心，项说：由于国民党的阴险狡猾，加上我的右倾，“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我的错误不小。但是新四军二部侦察科长谢忠良，作战科长李子高，特委书记李步新、县委书记杨明等几十人还在，我们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从头搞起，恢复发展我们的力量，坚持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顽固派，夺取革命胜利。

清明节那天，派刘奎、张一平、贺集胜等同志到高坛去背粮食，家里留谢忠良、李子高、李德和、郑德胜、夏东庆等放哨，由管理员刘厚总负责联络。

白天，项英晒衣服，把带的金子暴露了，刘厚总起了谋财害命之心。

晚上，项英同周子昆、黄诚（周的警卫员）、刘厚总等四个人，睡在赤坑山蜜蜂洞里面。

深夜两点，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刘厚总认为谋财害命的时候到了，于是连发数枪，把项英、周子昆打死，黄诚负了重伤，然后把项英带的金子和他们三个人的枪背走了。

走到下面山洞门口，碰到侦察科长谢忠良他们，谢问他到哪里去。他回答说：

“项副军长要我连夜去通知特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杨明来开会，有紧急情况。”谢忠良没有怀疑，让他走了，还让项英的警卫员、手枪排长李德和陪他一块去。走了约半小时，听到前面有狗叫声，刘厚总对李德和说：“前面可能有敌情，我先去看看，你在这里等候。”只见刘厚总越走越快，朝敌军所驻方向跑了。李德和见他惊慌逃跑，起了疑心，估计军首长出了问题，马上飞步跑回，（下转18页）

怀着高涨的热情，作好文史资料工作

——政治组上半年工作总结以及今后计划

上半年工作情况

今年上半年，政治组召开过三次工作会议，讨论计划，开展工作。根据各方面提供的线索，共发出征稿信九十封，收到史料一百九十件，比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增加了一倍以上。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和各项政策的落实，党内外民主生活，生动活泼，大大地调动了各方面人士撰写史料的积极性，大家怀着高涨的热情，忆过去，看现在，想将来，都愿为祖国实现四化出一分力，这是今年上半年来稿件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

政治组的组稿工作是通过各个渠道和多种方式了解情况，采取普遍征集与专题征集结合、因人出题与因题找人结合的方法，进行征集。今年上半年，主要征集以下三个方面的史料。

（一）北平和平解放

今年是北平和平解放的三十周年，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史料，过去很少征集。此次开展工作时，政治组的同志，对在京的有关人士先作了个别访问，对外地的则分别去信征求意见，然后于三月九日举行了一次专题座谈。现在收到的史料，主要有：

- （1）王克俊（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政工处处长）：《北平和平解放的回忆》；
- （2）周北峰（傅作义参加和平解放谈判的代表）：《北平和平解放》；
- （3）李世杰（原国民党华北“剿总”参谋长）：《北平和平解放我的认识和见闻》；
- （4）刘瑶章（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北平解放前夕的回忆》；
- （5）刘万春（原傅部师长）：《北平和平解放侧记》。

还有樊真的《回忆北平解放》、冯杰宸的《北平和平解放运动资料》、杜彦兴的《北平和平解放期间傅作义对阎锡山的谈话》、旷文澜的《北平和平解放见闻片断》、徐宗尧的《组织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前后》，等等。

王克俊委员，原系傅作义的政工处处长，他表示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但年迈体弱，自己撰写困难。后来了解到他的女儿王佩英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工作，